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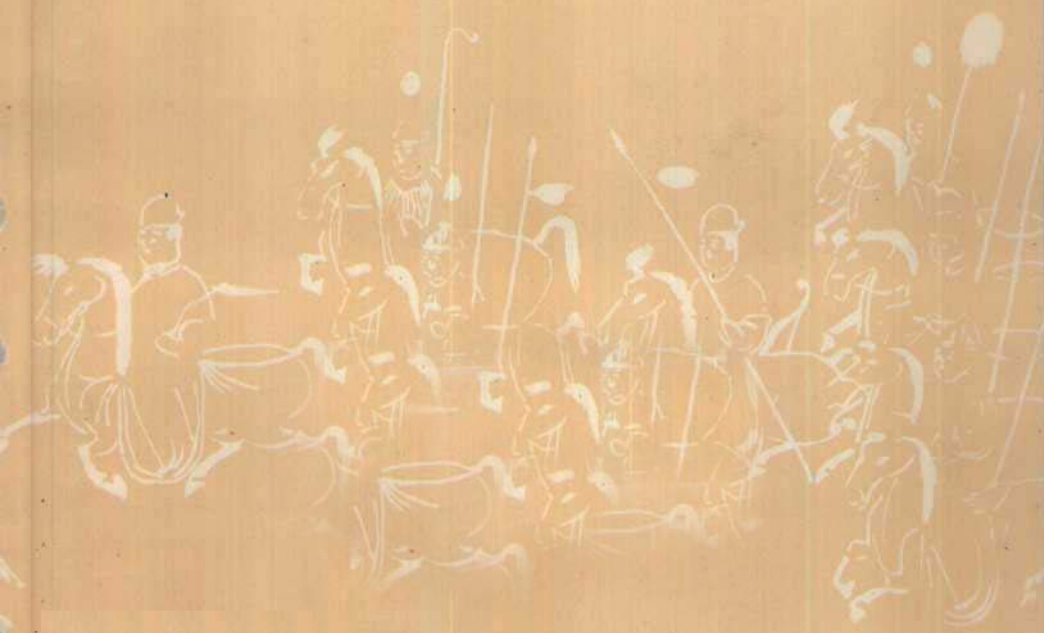
魏  
晉  
南  
北  
朝  
史  
研  
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魏 晋 南 北 朝 史 研 究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 编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一九八六·三·成都

封面题字：缪 斌  
责任编辑：张 力 李 楠  
封面设计：贾 梅

###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编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简溪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13.5 字数：350千字  
1986年3月第1版成都第一次印刷 印数1——3,500册

书号：11316·58 定 价：2.50元

# 目 录

-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过去和现在……………田余庆 ( 1 )
- 略谈五胡十六国与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缪 钺 ( 7 )
- 魏晋南北朝阶级结构试析……………朱大渭 ( 25 )
- 魏晋南朝庄园社会的阶级结构述论……………简修炜 夏毅辉 ( 46 )
- 简论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广西社会经济的发展…朱淑瑶 ( 81 )
- 东晋南朝浙江农业生产的发展……………王志邦 ( 95 )
- 魏晋北朝邺城初探……………牛润珍 ( 113 )
- 
- 试论三国时期南北均势的形成及其破坏……………邹云涛 ( 128 )
- 
- 评曹操的“唯才是举”政策……………马 欣 ( 146 )
- 占田制的形成及其存续问题……………陈连庆 ( 159 )
- 评晋武帝的民族政策
- 兼论匈奴刘猛、鲜卑树机能
- 反晋之性质……………祝总斌 ( 183 )
- 试论秦王苻坚的民族政策……………吴孝铤 ( 209 )

板楯蛮略论·····	吕一飞	( 226 )
关于王导与东晋政治的几个问题·····	王炎平	( 248 )
论黄白籍、土断及其有关问题·····	万绳楠	( 274 )
南北朝时期道教西传高昌试探·····	黄烈	( 288 )
北朝士族的兴衰·····	刘琳	( 300 )
北魏前期政治中的民族问题和崔浩之诛 ——与陈汉玉、陈汉平二同志商榷·····	莫久愚	( 322 )
北魏内行官试探·····	严耀中	( 338 )
嘎仙洞北魏石刻祝文考释·····	米文平	( 352 )
北魏末年人民起义与东魏北齐、 西魏北周的改革·····	刘精诚	( 365 )
论东魏——北齐的倒退·····	漆泽邦	( 383 )
关于西魏大统十三年敦煌计帐 户籍文书的几个问题·····	杨际平	( 404 )
后 记·····		( 429 )

#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 过去和现在

田 余 庆

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状况，各段很不平衡。长期以来，周、汉、唐、明诸朝历史最受重视，主要的原因是国家“一统”，有盛世，有英主，有武功，典章制度灿然可观，文化比较发达。至于分裂时期的历史，历来总是被忽视，因为它往往延续于动乱之中，没有多少可以被称道的文治武功，典章制度也很混杂。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总是处于被忽视、受冷落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当代史料编纂很盛，但都属于别史、杂史、载记之类，而且多出私家之手。后来正史编纂告成，大量史料也就散失殆尽。魏晋南北朝历时不过四百年，所含正史却有一志八书二史，如果加上隋书，总数达十二种，占二十四史之半。这一事实，正好说明魏晋南北朝史料纷繁杂乱，亟须作进一步的综合整理工作。但是在中国的王朝时期作过这种系统的综合整理工作并取得重大成果的，我认为只有北宋刘恕一人。经刘恕整理

的这四百年的历史资料，构成《通鉴》的一部分约一百二十卷。它揉合十几部正史的主要资料，还增添了一些正史以外的资料，于叙事中首尾相呼，南北对应，极具水平。《宋史·刘恕传》说：刘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这个评价是恰当的。刘恕以后数百年间，魏晋南北朝史料散佚更甚。唐宋以下颇富史料价值的笔记小说中，也没有多少魏晋南北朝史料可供钩稽。史料整理更无从说起。乾嘉考据风起，出现了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家考史著作。魏晋南北朝史以其所含正史种类特多，在诸家考史著作中占有较大比重。此外在正史的补注以及补表、补志中，涉及此段历史的也较多。乾嘉的务实学风是非常可贵的，这种学风影响下形成的考史、补史著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是乾嘉学者的史学思想缺乏新意，没有导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重大发展。

历代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成果不过如此，比之于汉、唐盛世历史来，这块学术园地显得非常荒芜。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古人囿于其时代水平，不具备理解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眼光，因而不能从深处思考这段动乱历史的意义和作用，不懂得魏晋南北朝历史为什么会孕育、生成出来，为什么又会孕育、生成另一段历史。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研究的成果，启发了中国史家的思想。一部分中国史家继承乾嘉务实学风，突破了乾嘉的狭隘眼界，重新探究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内涵，出现了一批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其中贡献最大的，是深受国内外史家景仰的陈寅恪先生。

陈寅恪先生具有爱国的、正直的士大夫情操和博学深思的中国文化习养。他在学术研究方面虽然保持着传统史学的风貌，但是他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都具有全新的内涵。他着眼于较长的历史过程，在较高的层次上探讨魏晋南北朝历史的脉络所在，提

出并解答了许多前人的认识所不能及的问题。他重视以不同的种族、家族、地域、文化为背景的社会集团的活动，从中发现历史的联系和推移，并以之解释各种纷繁的历史现象。他师承乾嘉而又不拘泥于乾嘉，在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中开辟新途径，奠定新基础，起了划时代的作用。陈寅恪的研究影响了几代史学工作者，近几十年来国内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最有成就的学者，几乎都是陈寅恪的弟子或私淑弟子，而他们的研究工作，基本上都是在陈寅恪的基础上进行的。诚然，陈寅恪的功力和成就更多地是在唐史研究方面。但是他的唐史体系在内容和方法上都是上承魏晋南北朝史。正是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发现了重大的线索，才使他的唐史结构得以形成。他分析唐史中的文化影响、制度渊源、地域关系和家族关系、学术思想的政治背景等方面的问题，跟他分析魏晋南北朝史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现在在这里召开魏晋南北朝史学术讨论会时，不能忘记这位硕果累累的先行者。

陈寅恪按照他自己的家世背景、学术素养从事研究，达到了一个真正的高峰。解放后，陈寅恪继续按照他自己的独特途径从事研究，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论著。不过陈寅恪毕竟有他自己的局限性。而陈寅恪受到局限的方面，解放后的史学界正在予以修正和补充。陈寅恪作过划时代的贡献，解放后的史学界也已经并将要继续取得划时代的成果，不过这两个时代的含义不同罢了。

陈寅恪关于种族问题的研究成果，大体在种族来源、人物家世血统之种族背景、上层人物在文化血统上的汉化或胡化等方面。解放后的研究，则除此以外还将种族问题上升为民族共同体问题，并进而研究各民族在此期间的社会结构及其发展历程，各民族的相互关系，民族斗争和民族融合，等等。

陈寅恪关于大族的文化特征和政治作用的研究成果，大体在家族背景、学术习染、婚宦状况等方面。解放后的研究，则除此以外还将大族看作一个特定的具有相应的经济基础的社会阶层，



并且把它放在社会各阶级的相互运动这一总的体系中来探讨。

陈寅恪关于制度渊源的研究成果，大体在典章制度的演化以及各种制度的关连。解放后的研究，则除此以外，还探索制度的基础和本质。

陈寅恪不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较少探索这方面的问题。解放后的研究，则以社会经济为重大课题，如均田制度、依附关系、部门经济、地方经济状况等等。

陈寅恪的局限性是不可免的。但是毕竟由于他筭路蓝缕的开拓之功，解放后才吸引了那样多的史学工作者从事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今天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欣欣向荣，再也不像过去那样处于冷落状态了。

但是千余年来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成果，就其积累总量说来毕竟有限。解放后由于各种干扰，特别是由于文革的破坏，魏晋南北朝史家浪费了不少精力，丧失了不少时间。今天看来，譬如垦荒，房前屋后，道畔水边，凡是方便易垦之处都已有入尽力勤耕，并不断获得成果，但有待开发的空白之处还是不少。在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民族史等方面，提出来的新课题并不很多。研究工作往往是围绕着一些老问题进行，而一时似乎又难于取得重大突破。这里让我举一个例加以说明。

四十多年以前，陈寅恪于《魏书司马睿传江东民族条释证及推论》文中，曾引用《陈书》所载梁末“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乘时而起的资料，认为这是江东“世局之一大变”。陈寅恪识见敏锐而又慎重，他把这一见解列入推论，当含有待证的意思。但是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人对这一问题作出深刻而又确凿的验证。“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大量出现在梁末历史上，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突然的事。它必然反映江左腹地经济的发展业已达到相当可观的水平。只有这样，在政治上、军事上足以割据一方的豪霸才能出现，他们乘侯景乱后局面而坐大，浮现

到了社会的表层，成为尔后陈朝重要的统治力量。但是江南腹地社会经济在六朝时的发展进程究竟如何，达到了怎样的水平，腹地豪霸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政治代表如何逐步兴起，凡此等等都是南朝历史的大事，我们却还没有千方百计地去发掘资料，加以说明。所以就这一点而言，陈寅恪四十多年前提出的问题，现在基本还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没有大的进展。

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这样一种现象：辉煌的文治武功尽管多出现于国家统一时期，但是地方经济的发展却往往是在分裂时期更为显著。一般说来，统一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心均在首都，只有首都以及首都所仰赖的经济供应线（例如漕运线）附近，首都与重镇之间交通线附近，才有较大的发展机会；此外的广大地区，发展速度要缓慢得多。《史记》所列举的重要都会，多半是分裂的战国时期各国的首都，而到了秦汉统一时期，大发展的只有长安、洛阳，其它都会多数不再发展，有的甚至趋于衰落。按照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理解长江以南经济、文化取得大的进展，不是在统一的秦汉时期，而是在分裂的六朝。梁陈之际南方腹地豪霸纷纷出现，正是南方在分裂时期发展较快的一种反映。从这里看来，我觉得分裂时期的历史并非没有积极意义可寻。何况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民族融合现象也多在分裂的年代特别显著。

在这次学术会议上，我听到有些南方省区的同志所作该省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发展状况的研究报告，颇有启发。这些报告能够在习见的史料以外发掘本省区的地貌、物产、土壤、气候等多种资料，进行探索。如果南方各省都作类似的探索，若干年后探索有成，也许我们对六朝时期南方腹地开发进程就能得到较多的了解。这不但可以大大开扩我们对南朝历史研究的视野，而且还可以把陈寅恪所作江东“世局之大变”的推论加以证实。

从这里我还想到，今后若干年内，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应

当在务实的基础上多提出一些新问题加以探索，而不要把研究工作局限在几个老大难的问题上。外国汉学家的研究成果，也要多多吸收。探索新问题，借鉴外国，可以丰富我们的思想，有助于寻找解决老大难问题的途径。发展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工作，一需要功力，一需要思想，思和学相辅相成。陈寅恪取得丰硕的成果，原因也在这两个方面。为了矫正长期以来史学研究中空泛的弊病，目前应当把扎扎实实放在第一位，把热热闹闹放在第二位。也许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能出现较大的突破。也许再有若干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队伍中能出现几个新时代的陈寅恪，他们既有微观的功力，又有宏观的眼光；既熟悉中国传统的史学，又有精深的马克思主义修养。这样，魏晋南北朝史就会成为高水平的学科。不过在这种成就出现以前，我们还是要多研究具体问题，力求多取得具体创获。具体创获哪怕细小，其总和将是可观的。

社会科学的发展似乎有这样一种规律：在取得重大突破之前，往往需要一个资料积累和整理过程。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对学术知识材料的搜集整理，为资本主义时代学术大发展作了准备。中国乾嘉之际用考据方法整理资料，研究学术，为一个世纪以后人们用思想来探索社会历史提供了重要的素材。现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同各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一样，处在拨乱反正之后行将起飞的时刻。为了迎接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的高潮，我们应当多做一些具体的扎实的准备工作，并且多培养一些适应这种需要的有功力又有眼光的青年人材。

# 略谈五胡十六国 与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

缪 钺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在成都举行魏晋南北朝史学术讨论会，随即成立学会。我因久患目疾，读书写字都颇困难，故未能写出完整论文，仅就民族关系问题，在大会上作一口头发言，略抒己见，就正于与会诸公。后来学会拟印《论丛》，向我索稿，我即根据当时发言的零碎备忘录，加以连贯，并略作补充，写成此篇，仍然象是发言稿，而不能算做一篇论文也。

一九八五年三月缪钺自记。

## 一、引言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期，在北方尤其

是如此。在五胡十六国与北朝的三百年中，各民族在北方辽阔的七地上，接触频繁，其中虽然也有歧视、压迫甚至于仇杀，但是更主要的却是互相学习，互相渗透，最后，终于在汉族的高度文化与经济的影响之下融合起来，同时也保存了各民族的特长与生命力。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间的关系极为复杂变化。但是有一个总的趋势，就是结集于一种高度文化之中而趋向于渗透、融合，破除种族界限，不断的为中华民族增加新的生命力。在民族区别的看法上，文化重于血统，种族间的歧视是暂时的，而文化上的融合则是永久的。陈寅恪先生说：“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南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1〕其实，不仅北朝如此，全部中国历史中都是如此。这里面有一种主导思想在起作用，这种思想形成于先秦。

当春秋时期，周承继夏、殷的文化，形成所谓“华夏”族，有高度发展的经济与文化，而当时各少数族，如所谓“戎”、“狄”、“蛮”、“夷”者，不但散居边疆，而且在中原与华夏族杂居共处，民族间矛盾尖锐，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2〕如何处理民族间的关系，是当时迫切的问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提出一种主张：一方面要讲“华夷之辨”、“夷夏之防”，主张尊夏攘夷，而另一方面又主张，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实在是一种辩证的结合，其用意即在于一方面保护华夏的高度文化不受少数族落后文化的干扰侵犯，而另一方面又愿意使少数族接受华夏文化，引而进之，一视同仁，并不因民族血统不同而永远歧视、排斥。

孔子因鲁史而修《春秋》，在民族关系上，即体现出他的这两种主张。当春秋前期，齐桓公用管仲，成霸业，当时狄人灭邢、灭卫，桓公会诸侯兵以救之，迁邢，存卫；楚人屡次北上伐

郑，桓公会诸侯伐楚，盟于召陵，遏其北进；华夏得以晏安，其高度文化不至于被落后的少数族所毁灭。故孔子盛赞管仲辅齐桓称霸之功，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3〕这是一个方面。同时，据《春秋公羊传》的说法，孔子修《春秋》，是借修史以寄托其政治哲学的理想，假设划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为“三世”，借以比况人类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即是据乱、升平、太平，而每个阶段书法不同。在据乱之世（即“所传闻之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在升平之世（即“所闻之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在太平之世（即“所见之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4〕洪廷彦同志在其所作《评〈春秋公羊解诂〉》一文中认为：“所谓太平之世夷夏无别，是以夷狄行礼义为前提的。”〔5〕这个意见很对。也就是说，夷狄接受华夏文化，就可以看作是华夏了。

也许有人会说，公羊家之解释《春秋》，可能是引申之义，未必尽符孔子本旨。现在我们引《论语》所记孔子之言，看看孔子对夷狄的态度。《论语·八佾》：“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是称赞“夷狄”的政治秩序有时还胜于华夏。《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在中原不能行其道，而想居九夷，可见他认为“九夷”是可以经过教化而有所提高的。康有为《论语注》注这两条时说：“故夷狄而有德，则中国也；中国而无德，则夷狄也。”又说：“其始夷夏之分，不过文明野蛮之别。故《春秋》之义，晋伐鲜虞则夷之，楚人入陈则中国之，不以地别，但以德别。”康氏的注解很能体会到孔子的意图，即是夷夏之分，主要看文化，而不仅看血统。

其实，孔子这种关于夷夏关系的意见，也并非全是他个人主观想出来的，而是根据以前历史发展的事实而总结出来的。当夏朝

统治中原时，殷商还是一个从东方海滨兴起的落后民族，后来他们进化了，于是灭夏而入主中原，成为华夏；当殷商统治中原时，周族兴起于幽岐，“陶夏陶穴，未有家室”。〔6〕在殷商人看来，周族也是夷狄。但是后来周族受商文化的薰陶而进化了，灭商而代之，“周监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哉！”也变成华夏了。可见夷夏之别并非固定不变的，应视其文化高下而有所改变，周族灭商，变为华夏，就是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孔子是殷人之后，而殷是为周灭的，如果从民族血统的狭隘立场来看，孔子应该敌视周人。但是孔子却称赞周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见他的夷狄观是辩证的，周人接受夏商文化，而又加以改进，即已变成华夏了。

在春秋战国五百年中，许多所谓“戎、狄、蛮、夷”，在与华夏族频繁的接触之中，逐渐接受华夏文化，增进了融合。譬如荆楚，西周人称之为“蛮荆”〔7〕。楚君熊渠自己也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8〕但是自春秋中叶以后，楚与中原诸侯交接频繁，其文化突飞猛进，到战国时，楚国产生了灿烂的文化（近年来出土的许多楚文物足以证明），而且孕育了伟大的诗人屈原，产生了优异的新文学作品《楚辞》，风靡全楚。吴、越最初也是被看作蛮夷的，但是到春秋末期，吴公子季札出聘中原，在鲁国听乐观诗，加以评论，表现出高度的文化修养。到了秦汉时期，先秦史籍中常见的许多“戎”、“狄”、“蛮”、“夷”等族都不见了，他们中绝大多数都融合于具有高度文化的华夏族中，形成所谓“汉族”，当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造成两汉国势的昌盛。

## 二、五胡十六国时期

五胡十六国、北朝时期的民族情况亦复如是。自从西晋怀帝

永嘉丧乱之后，内迁各族如匈奴、鲜卑、羯、氐、羌等，纷纷在中原建立割据政权。其后，鲜卑拓跋氏统一北方，建立北魏王朝，后又分裂为东魏、北齐及西魏、北周，后来北周灭北齐，汉人杨坚代周，建立隋王朝，北方统一。自永嘉丧乱至此长达二百七十余年（公元307~581年）。在此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各民族间的关系虽然错综复杂，出现了歧视、压迫，甚至于仇杀，但是总的趋势则是：一度建立政权的各少数族，在汉族高度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之下，逐渐趋于融合，形成为中华民族之整体。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的：“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9〕而中国自先秦以来孕育而成的一种观念，即是民族间的关系，文化重于血统，这对于促进民族融合更起了积极的作用。

关于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民族关系。

五胡之中，匈奴、氐、羌诸族久居内地，与汉人接触频繁，慕容鲜卑居辽东近塞，亦“渐慕诸夏之风”〔10〕。各族上层分子尤其多是读书能文，深染华化者（如汉主匈奴刘渊“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其余各族类此者尚多有之）。及其在中原建国之后，想巩固其统治，则亦多是重用汉族士大夫，采用汉、魏、晋的封建统治制度，提倡儒学，振兴教育。这在当时成为一种趋势，所以五胡各族在接受汉化上虽然程度不同，而趋向则一，其中慕容鲜卑与氐族尤为突出。只有羯族，比较粗犷，对汉化有抵触。

鲜卑慕容廆在大棘城（辽宁义县）建立政权后，“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在这些“流亡士庶”中，有不少是汉族世家的才智之士。在永嘉丧乱之际，中原人士大部分避难渡江，另外一部分入河西依靠张氏，而在山东、河北



的一部分土族则流入东北，如裴嶷、阳裕、刘瓚、封奕、封裕、高瞻等，他们都为慕容氏君主所任用，在帮助慕容鲜卑迅速汉化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慕容氏的前燕很注重儒学教育，任命“儒学详通”的刘瓚为东庠祭酒，教鲜卑贵族子弟，世子慕容皝亦“束脩就业”，慕容廆亲临听讲，史称“路有颂声，礼乐兴矣”。继慕容廆为君者，如慕容皝、慕容儁都是“雅好文籍”，喜欢讲论义理，可见鲜卑慕容氏汉化之深。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氏族苻氏。前秦主苻坚生长于内地，八岁即请师就学。他即位之后，信任汉族政治家王猛，在文化、政治方面力求汉化，严厉制裁氏族重臣樊世等反王猛、反汉化的反动势力。王猛是汉人，但是他看到氏族统治者苻坚性格开明，锐意接受汉化以治国，所以他也愿意尽心辅佐。据史书所载，苻坚的行政措施，如“修废职，继绝世，礼神祇，课农桑，立学校，……其殊才异行、孝友忠义，德业可称者，令在所以闻”。这完全是仿汉魏以来的施政方针。苻坚很重视儒学教育，他“广修学宫”，召郡国学生、公卿子弟就学，有才德者皆旌表之，并且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与博士问难。苻坚曾对博士说：“朕一月三临太学，……庶几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坠，汉主二武，其可追乎！”他的内心中似乎已消除了民族隔阂，俨然以继承、维护周公、孔子以来的汉魏文化传统自居。正因为苻坚善于接受汉族文化而付诸实施，所以在五胡十六国纷乱时期，苻坚前秦的政绩最好。史称“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在苻坚的影响之下，他的弟弟苻融、儿子苻丕、侄子苻朗，也都是高度汉化者。《晋书·苻坚载记》说：“永固（苻坚字）雅量瑰姿，变夷从夏，……遵明王之德教，阐先圣之儒风，抚育黎元，忧勤庶政。”这个论断是中肯的。总之，在“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前秦主苻坚可与北魏孝文帝媲美，都是少数民族统治者中